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detailed, light-colored map of Ibero-America, showing the geographical outlines of Spain, Portugal, and the various countries of Latin America. The map is rendered in a fine, dotted or stippled style, providing a textured backdrop for the text.

伊比利亚美洲研究

Colección de Estudios Iberoamericanos

(2015—2016)

江苏师范大学伊比利亚美洲研究中心编著

主 编 朱 伦 【西】徐利奥·里奥斯

副主编 沙先一 蓝 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比利亚美洲研究:2015—2016/朱伦, (西) 徐利奥·里奥斯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161-9075-3

I. ①伊… II. ①朱… ②徐… III. ①西班牙—文集 ②葡萄牙—文集
③拉丁美洲—文集 IV. ①K955.1-53 ②K955.2-53 ③K9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010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安芳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409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葡关系的发展历程

[葡] 卡门·曼德思

(蓝博 译/朱伦 校)

内容提要 早期来中国的欧洲列强中，葡萄牙是最早来最晚离开的。从1557年葡萄牙被允许在澳门居住开始，澳门逐渐发展成为葡萄牙一块独立在海外的领土，几个世纪以来，澳门半岛上的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和平共处。耶稣会传教士作为葡萄牙使者来到中国，向中国大陆传播了宗教文化及科学知识。20世纪末，葡萄牙政治体系历经两个阶段——从独裁到1974年的民主改革，中葡关系的发展也因葡萄牙的政权变化而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从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到1979年正式建交。澳门回归中国最终的解决方案是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模式。2003年，中国政府在澳门建立了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就变成了中国与葡语世界商贸及文化互联互通的平台。

引言

三言两语不可能完整地阐述中葡近500年的交往史，笔者力图通过三大要点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两国关系的发展史。首先，从1557年起，葡萄牙正式在澳门建立定居点，两国签署了一份非正式的友好条约，允许将澳门设为葡萄牙在中国境内的一块单独行政区域，便于中葡两国开展务实、互惠的通商活动。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澳门与葡萄牙其他海外殖民地不同，它虽然名义上归葡萄牙王室管辖，但是由于王室无暇兼顾，大多数时间它都处于自管状态。从外交层面来说，中葡主要通过澳门来实现双边交往，现代西方文明和基督教通过葡萄牙传入清朝，同时传入中国的还有发达的西方科技。

其次，直到1979年，中葡才解决两国之间一直悬而未决的建交问题，之前葡萄牙“第二共和国”(El Estado Novo)独裁政府拒绝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政府。澳门社会在葡萄牙政府的管理下一直保持稳定，只有在1966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有过短暂的动荡，期间澳门总督府遭受攻击，中国激进派试图以暴力手段收回澳门主权。1980年中葡正式建交后，两国官员开始频繁互访，两国关系逐渐密切，澳门回归问题也得到了实质性的进展。

最后是1999年，中国正式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不过澳门通过主办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仍然扮演着中葡关系中间人的角色。澳门回归后，中葡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国通过对葡投资和高层访问不断加深其在葡的影响力。

一 从1513—1949年：澳门的诞生及首个外交周期

1510年葡萄牙占领印度西海岸重镇果阿，次年占领马来半岛重镇马六甲，紧接着进入苏门达腊，并将果阿设为葡萄牙在远东殖民统治的中心。第一个到中国来的葡萄牙人名叫豪尔赫·阿尔瓦雷斯（Jorge Álvares），他到中国的时间是1513年，在他之后的是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后者是葡萄牙派往中国的首位使者。托梅·皮雷斯原为葡萄牙王室的药剂师，后随东征船队来到马六甲担任药物生意经纪人。被派往中国后，他历经磨难，写下了著作《东方志》（*A Suma Oriental*）。

但是皮列士的到来并没实质性地推动中葡关系的发展，因为当时的中国对外关系主要以“朝贡”体系为主，缺乏外交弹性。所谓“朝贡”体系是指从明朝永乐年开始，^① 设立“译馆”便于中国与外国的朝贡制度运行。早期中国的“对外关系”，主要目的是让其他民族俯首称臣，与邻国的交往强调的是文化优越、让对方附庸并签署朝贡协议；基于此，当时的中国政府会定期邀请周边的“蛮族”来访。受此体系的影响，中国早期发展对葡关系的目的也以“朝贡”为主，强调自身“天子”地位，这对当时两国关系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②

1514年，中国明朝正德皇帝颁布了非贡期入华进贡的事团令，允

许葡萄牙商船进入中国“朝贡”。1518年皮列士率团来访中国，这是两国开始第一个外交周期。次年，正德皇帝病危，临死前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来明的使团全部离境，并监禁了皮列士，驱逐葡萄牙使团。接到遣返令的葡萄牙使团拒绝离境，于是，中葡舰船在西草湾交火，中葡关系由此破裂。^①

实际上，皮列士率领的葡萄牙商船到访中国，其目的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不过，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凡是外国人来，就是来进贡的而已。^② 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对于中国的角色逐渐产生变化，从开始的“朝贡者”转变为“商贸者”。^③ 澳门也是从这时起，成为中葡以及中国与西海域邻国进行商贸的一块重要“飞地”，并且成为中国内陆抵御海盗入侵的桥头堡。^④ 此后，澳门逐渐成了中国接收多元文化和利益的“器皿”。直到1554年，中葡关系有了新的进展，葡萄牙的日本航线司令莱奥内尔·德·索萨（Leonel de Sousa）与广东道副使达成口头协议，在交付税收的情况下，允许葡萄牙在中国境内进行正常的商贸活动。此后，葡萄牙人得以在澳门居留，澳门开始对外国商船开放，这里也正式成为各国商人贸易聚居点。^⑤

澳门作为葡萄牙本土和远东联系的中间地，拥有高度的自治权，也

^① WU, *op. cit.*, pp. 35—38.

^② WILLS, John Elliot Jr., *China and Maritime Europe, 1500—1800: Trade, Settlement, Diplomacy, and Miss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11, pp. 28, 30—31. DISNEY, Anthony R., *A History of Portugal and the Portuguese Empire, Volume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va Iorque, 2009, p. 291.

^③ COSTA, João Paulo Oliveira, *A Descoberta da Civilização Japonesa pelos Portugueses*,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Macau, 1995, p. 111.

^④ WU, *op. cit.*, p. 41. WILLS, John Elliot Jr., *Embassies &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4, p. 52.

^⑤ RAMOS, João de Deus, *Portugal e a Ásia Oriental*, Fundação Oriente, Lisboa, 2012, p. 106. BARRETO, Luís Filipe, “A Condição de Macau: Elementos para uma análise Histórico-Cultural”, *Administração*, n. 30, Vol. VIII, 1995, p. 780.

^① WU Zhiliang, *Segredos da Sobrevivência—História Política de Macau*, Associação de Educação de Adultos de Macau, Macau, 1999, pp. 32—33, 38.

^② HSU, Immanuel,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va Iorque, 1970, p. 152. FORD, Christopher Ashley, *The Mind of Empire: China's History and Modern Foreign Relations*,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Lexington, 2010, p. 55.

称为葡萄牙帝国的“东方影子”(Shadow Empire)。^① 纵观澳门发展史,其商贸活动和外籍人权受葡萄牙政府和律法约束。这样的发展模式也称“澳门模式”,其核心是为中国和海外的贸易寻找一个利益平衡点,保障在澳居住的外国人的安全。^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澳门自身逐渐拥有了一定的自治权;早在1583年,澳门便已拥有属于自己的市政府,市政府拥有独立的行政权力。但是,葡萄牙仍然实际控制着澳门,如澳门的关税立法、政府财政以及外交行使权。^③ 之后,随着中国内地和澳门半岛的联系日益紧密,葡萄牙开始允许中国内地的资金和人员自由进出澳门,但澳门仍不属于中国管辖。^④

16世纪末,耶稣会传教使团受葡萄牙王室委派来到中国,这算是第一批西方驻中国使者。在这个时期,中国普遍将外国使团的到来看作朝贡,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建立长期的联系机构。这些传教士以宗教使者的身份为中国政府出谋划策,为东方贡献了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技能。

科英布拉大学人文艺术系成立于1547年,曾经培养过一大批优秀的耶稣会传教士,例如马特奥·里奇(Matteo Ricci)、托马斯·佩雷拉(Tomás Pereira),因而被誉为培养葡萄牙驻中国大使的摇篮。科英布拉

^① PTAK, Roderich, op. cit., pp. 139—140. NEWITT, Malyn, *A History of Portuguese Overseas Expansion, 1400—1668*, Routledge, Londres e Nova Iorque, 2005, pp. 92—93. WINIUS, George, “The Shadow Empire of Goa in the Bay of Bengal”, *Itinerario*, Vol. 7, n. 2, 1983.

^② FOK, Kai Cheong, “The Macao Formula at Work—An 18th Century Qing Expert’s View on Macau” in Saldanha, António Vasconcelos e Alves, Jorge Manuel Santos, *Estudos de História do Relacionamento Luso-Chinês: Séculos XVI—XIX*.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6, p. 222. ALVES, Jorge Manuel dos Santos, “Natureza do Primeiro Ciclo da Diplomacia Luso-Chinesa (séculos XVI a XVIII)” en SALDANHA, António Vasconcelos e ALVES, Jorge Manuel Santos, *Estudos de História do Relacionamento Luso-Chinês: Séculos XVI—XIX*,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Macau, 1996, p. 190.

^③ PEREIRA, Francisco Gonçalves, *Portugal, a China e a “Questão de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Macau, 1995, pp. 17—19.

^④ WU, op. cit., pp. 75—76.

大学培养的传教士还为中国带去了西方科技:数学、天文学和艺术,他们不仅在中葡交往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还赢得了历代中国皇帝的尊重。^① 在1667—1784年间,随着西方传教士大量登陆中国,这一时期也被誉为“西方使者繁荣时期”,这期间著名的葡萄牙籍使者共有六位。到了康熙年间,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传教士,葡萄牙传教士在中国宫廷中占有的地位达到最高峰。

葡萄牙的传教士同时也是中葡两国对话的媒介,他们的存在可以让基督教在中国得以传播,实现了两地宗教的交流融合,他们也被称为“两国宗教的百科全书”。^② 在1750—1777年的庞巴尔(Pombal)首相时期(何塞一世时期),对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传教士实施削减政策,澳门也不例外。他的这一措施确实加强了葡萄牙王室在海外的势力,但是也削弱了国家影响力。

从18世纪中叶开始,葡萄牙开始专注于有效管理各大洲的殖民地,尤其重视加强澳门和印度殖民地政府之间的联系。葡萄牙有意识地通过印度干预澳门的事务,直到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通过暴力手段敲开了中国开放的大门,将现代秩序强制性地带入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1842年中国与英国签署了《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并开放口岸与西方国家通商。^③ 1849年葡萄牙关闭中国设在澳门的海关,拒交租地租银,并以武力手段赶走中国政府官员,

^① VON COLLANI, Claudia, “Les Activités Scientifiques de Matteo Ricci en Chine” en Landry-Deron, Isabelle (ed.), *La Chine des Ming et de Matteo Ricci (1553—1610)*, Les Éditions du Cerf/Institut Ricci, Paris, 2013, pp. 173, 182.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Christophorus Clavius: um dos mais famosos estudantes de Coimbra”, consultado em 10 de dezembro, 2014, http://www.uc.pt/org/historia_ciencia_na_uc/Textos/cienciasexactas/christoclavius.

^② RAMOS, op. cit., pp. 93, 127—133.

^③ ALVES, Jorge Manuel dos Santos, “Natureza do Primeiro Ciclo da Diplomacia Luso-Chinesa (séculos XVI a XVIII)” en SALDANHA, António Vasconcelos e ALVES, Jorge Manuel Santos, op. cit., pp. 201—202. CONCEIÇÃO, *Macau entre Dois Tratados com a China, 1862—1887*, Macau, ICM, 1988, p. 174.

夺取中国在澳门主权。1887年中葡两国在北京签署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俗称《中葡北京条约》),中国允许葡萄牙长驻和管理澳门。^①

1910—1911年,葡萄牙和中国先后废除了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共和制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独立和反封建意识,中国国内对废除19世纪被迫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日渐高涨,例如:在民族独立意识推动下,中国向葡萄牙政府提出废除1887年签署的《中葡北京条约》,收回澳门主权;之后,在1928年,中葡对条约进行了修订。

1930年年初,中国已经收回了除香港和澳门外的大部分20世纪割让给西方列强的领土。1945年中国获得抗日战争胜利,随后中国向葡萄牙提出收回澳门主权,之后,两国在1947年签署新的协定,但是和1928年时候一样,新协定只是对旧协定进行了微调,并未实质性地解决澳门问题。^②

二 从1949—1999年:从拒绝承认 中国共产党政权到澳门回归

直到1974年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去世后,葡萄牙才开始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之前,萨拉查时期的葡萄牙只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1949年战败后,蒋介石逃亡台湾成立的政府)。

^① PTAK, Roderich, "Macau entre la Chine et l'Asie Maritime: Cycles d'Économie" en FELIPE DE ALENCASTRO, Luiz e BETTENCOURT, Francisco (eds.), *L'Empire portugais face aux autres Empires*, Maisonneuve & Larose/Centre Culturel Calouste Gulbenkian, Paris, 2007, p. 151. WU, op. cit., pp. 229, 237—38.

^② MENDES, Carmen, *Portugal, China and the Macau Negotiations, 1986—1999*.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13 e WU, op. cit., pp. 259—264, 311.

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由于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混乱,澳门和香港的主权问题不是毛泽东政府战略的重心所在,而且对处于特殊时期的中国来说,这两个地方反而成了政府打破西方外交封锁的工具。例如1950年的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政府通过港澳进口战略物资,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虽然无暇兼顾,但是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布局澳门回归战略。1949年中国政府直属企业南光(集团)有限公司在澳门成立,该公司通过投资和商贸活动不断影响着澳门,让内地政府在澳门半岛影响力逐渐扩大。^①

回归前的澳门名义上受葡萄牙政府管辖,其发展方向取决于三股权力的平衡:葡萄牙驻澳门总督府、广州省政府以及北京政府。1960年后上述平衡被打破,国民党政府势力进入澳门,在澳进行反对共产党政府的活动。

1966年12月3日,受国民党政府煽动,大批澳门师生聚集在葡萄牙驻澳总督府前进行示威活动,当局开枪扫射了示威民众,史称“一二·三”事件(事件因发生的日期而得名)。这一年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阶段,该事件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愤怒,各地的“红卫兵”云集拱北海关,试图冲破阻拦进入澳门。随后,中葡政府就该事件进行了紧急磋商:全面清除国民党在澳门的势力;禁止在澳门进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的活动;对死难家属进行赔偿;葡萄牙政府继续保持管辖澳门等。^②

从1970年起中葡关系开始有了较大的改变。葡萄牙“第二共和国”政府有意减轻中国共产党政府在澳门问题上施加的压力,于是在次年的

^① FERNANDES, Moisés Silva, *Sinopse de Macau n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1945—1995*, Fundação Oriente, Lisboa, 2000, pp. xii—xvii.

^② PEREIRA, Francisco Gonçalves, *Accommodating Diversit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Macao" [1949—1999]*,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Lisboa, 2013, pp. 94—9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 de setembro de 1963. CASTANHEIRA, José Pedro, *Os 58 dias que abalaram Macau*, Publicações Dom Quixote, Lisboa, 1999.

联合国大会上,葡萄牙给中国政府取代台湾政府重返联合国投了赞成票。^① 1972年,中国驻纽约大使向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提出,要求将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将港澳问题归为中国内政。^② 中国此举意将澳门“被殖民”身份剔除,中国也借此反击苏联对澳门问题的指责。实际上,中国此举具有深远而务实的意义,这为港澳最终回归奠定了基础,也消除了它们独立的可能性。^③ 此外,中国政府将澳门定义为一块“外占领土”而不是一块“殖民地”,时任葡萄牙统治者萨拉查对此也表示接受。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民主革命成功,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承认澳门是葡萄牙非法侵占。

葡萄牙在实行非殖民化政策后,迅速与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起了外交关系,并将中葡关系发展视为外交事务的重点。1976年1月6日葡萄牙外交部发表了两点声明:第一,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第二,中葡双方将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澳门问题。^④ 之后,葡萄牙政府提出归还澳门,不过正值“文化大革命”末期的中国政府并未接受,主要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中国政府担心苏联共产党借机通过葡萄牙共产党扰乱澳门。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澳门回归问题悬而未决,只因中国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而已,中葡之间并

不存在任何矛盾。^①

1976年葡萄牙颁布了《澳门组织章程》,成立澳门立法议会,新的政治体制下澳门实现了高度自治。同年葡萄牙颁布的新宪法中明确表示,澳门是葡萄牙管辖下的特殊地区,并非殖民地。^②

这个时期,中国政府对澳门回归问题保持沉默,并未让中葡关系发展停滞,两国达成了许多非正式协议,这些都是两国大使在法国巴黎频繁会面的成果(1964年戴高乐在巴黎建立了中法外交平台)。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就澳门问题达成协议,两国谈判内容在当时属于“国家机密”,直到1987年才正式对外公布。在这份双边协议中,葡萄牙明确了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归还时间和细节,将在适当时候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此外,葡萄牙政府禁止苏联和台湾当局利用澳门开展敌对中国的活动。^③

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袖邓小平对澳门的角色进行了明确定义:中欧的媒介地。1982年邓小平针对澳门、香港和台湾问题提出了

① “China Welcomes Portuguese Government Statement: Yugoslav Report”, TANJUG, Pequim, 13 de janeiro de 1975, en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15 de janeiro de 1975, Londres, FE/4804/A1/1. FERNANDES, Moisés Silva, *Sinopse de Macau*, op. cit., p. 354. MARTINS, António Coimbra, *Esperanças de Abril*, Perspectivas & realidades, Lisboa, 1981, p. 433. FERNANDES, Moisés Silva, “Contextualização das negociações de Paris sobre a normalização das relações luso - chinesas, 1974—1979”, *Negócios Estrangeiros*, n.º 16 Especial, Instituto Diplomático do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2010, pp. 31—33.

② *Estatuto Orgânico de Macau*, Lei 1/76, 17 de fevereiro de 1976. GARCÍA, Leandro, *Macau nos Anos da Revolução Portuguesa-1974—1979*, Gradiva, Lisboa, 2011, p. 23. *Constituição da República Portuguesa*, N.º 5 e N.º 306, 1976. GARCIA, Leandro, “Os Anos da Grande Mudança 1974/1979”, en BARRETO, Luís Filipe (ed.) *Trabalhos do Seminário Rumos de Macau e das Relações Portugal-China (1974—1999)*,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Lisboa, 2010, pp. 26—27.

③ MARTINS, op. cit., p. 434. “Comunicado Conjunto do Govern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e do Governo da República Portuguesa sobre o Estabelecimento de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entre a China e Portugal”, Paris, 8 Fevereiro 1979, Serviço de Informação do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Lisboa, Arquivo Histórico-Diplomático,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Ata das Conversações sobre a Questão de Macau”, Paris, 8 de fevereiro de 1979; Arquivo Histórico - Diplomático,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Lisboa.

① Resolução n.º 2758 (XXVI) da Assembleia Geral das Nações Unidas. FERNANDES, Moisés Silva, “O Diplomata José Calvet de Magalhães e a Questão de Macau nas Relações Luso - Chinesas, 1946—1971”, *Administração*, n.º 72, Vol. XIX, 2006, pp. 792—793.

② Assembleia Geral da Organização das Nações Unidas, A/AC.109/396 de 8 de março de 1972, UNGA A/AC.109/L.795 de 15 de maio de 1972 e FO371/175931.

③ MENDES, Carmen, *Portugal, China and the Macau Negotiations*, op. cit., p. 34.

④ Comunicado à Imprensa, Serviços de Imprensa do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Lisboa, 6 de janeiro, 1975, Arquivo Histórico-Diplomático, e *Diário de Notícias*, 9 de janeiro de 1987.

“一国两制”模式，并公开否决了所有由旧中国政府签署的不平等条约。

1984年中英高层会面达成一致：香港将在1999年租约到期后回归中国。之后不久，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访问葡萄牙，这是新中国元首首次访葡，两国领导人就澳门问题进行了“密谈”，中国对葡萄牙表示两国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1985年，葡萄牙总统回访中国，会见了时任中国总理赵紫阳，葡萄牙对中国表示两国可以举行正式外交谈判解决澳门问题。

中国政府从国家战略高度，对香港和澳门这两块历史渊源不同的殖民地采取同一解决方案。赵紫阳曾向安东尼奥·拉马尔霍·埃亚内斯(Ramalho Eanes)指出：澳门平稳过渡不仅是领土平稳过渡还是两种文化的平稳过渡。^①埃亚内斯回到葡萄牙后着手准备移交澳门主权事宜，并确保此事不受总统换届影响。笔者认为，香港的回归对澳门问题实际上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是澳门回归的直接诱因，因为从历史角度看，香港和澳门是两块有本质差异的占领地，在提出收回香港之前，中国从未主动提出收回澳门主权。^②

对于当时的葡萄牙来说，将澳门主权交还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议题，之后受到1975年东帝汶去殖民化的影响，葡萄牙政府才开始思考体面解决澳门问题。鉴于澳门在远东的重要性远不如香港，且中葡关系存在一定的不对称性，葡萄牙政府在澳门回归问题上相比起英国政府要积极和配合得多。^③1987年4月13日，时任中国总理赵紫阳和葡萄牙总理卡瓦科·席尔瓦分别代表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

署《中葡联合声明》。1987年，中葡两国在各自政府内获得《中葡联合声明》的批准。中国政府允许澳门在香港回归之后两年正式回归，从1987年到1999年这12年时间，被称为过渡期。

澳门回归后，那些持葡萄牙护照在澳门居住的中国人将面临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法律不允许双重国籍的存在。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国籍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澳门人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如放弃中国籍加入葡籍，会被社会视为耻辱。后来，两国政府采用了“混合制”来解决上述问题：但凡在澳门居住的中国人，无论是中国籍还是葡萄牙籍，都统一归为澳门人，但是葡籍澳门人一旦离开澳门进入内地则等同于中国籍。

从联合声明生效到正式回归典礼期间，被称为过渡期。与中英关系在香港回归过渡期经历多番起伏不同，再澳门回归过渡期间，中葡关系一直较为平稳。期间，对中国国际关系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该政治事件导致中国与西方关系破裂，英国更是指责中国政府罔顾人权，导致中英关系一度紧张。但是这期间，葡萄牙政府没有受此影响，稳步推进澳门回归进程。在中国对外关系最艰难的时期里，葡萄牙在大部分涉及澳门的问题上与中国政府合作良好。^①

葡萄牙希望回归后的澳门能长期在行政、经济、社会发展上保持独立性，并且摆脱对香港的依赖（香港是世界最重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而澳门仅有服务业）。对此，过渡期间葡萄牙政府致力于通过交通设施建设来减少澳门对香港的依赖性，如澳门国际机场、外港码头、新

^① *Expresso*, 30 de agosto de 1986.

^② RAMOS, João de Deus, “Declaração Conjunta sobre Macau: Um Olhar Retrospectivo”, en ALVES, Jorge dos Santos (coord.), *Portugal e a China-Conferências nos Encontros de História Luso-Chinesa*,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 422.

^③ Para uma análise mais detalhada das negociações luso-chinesas, ver: MENDES, Carmen, *Portugal, China and the Macau Negotiations*, op. cit.

^① LO, Shiu H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cau*,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4. CATARINO, Pedro, “Macau Visto de Quatro Ângulos em Quatro Momentos da sua História: De Macau, de Hong Kong, de Lisboa, e de Pequim”, en BARRETO, Luís Filipe (ed.) *Trabalhos do Seminário Rumos de Macau e das Relações Portugal-China (1974—1999)*,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Lisboa, 2010, p. 103.

澳凼 (Macao - Taipa) 大桥等。^① 对中国来说, 最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协调和管理这个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政府官员和语言。

1999年12月20日, 葡萄牙正式将澳门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交接仪式上郑重宣布: 澳门回归后, 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这种“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方式也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基础。^②

三 从1999年至今: 迈上新台阶

2014年, 是中葡建交三十五周年, 澳门回归十五周年。在这段岁月中, 澳门始终保有葡萄牙的影响, 并坚持其历史使命: 作为中国与欧洲和葡萄牙语世界交流的桥梁。我们如何来评判近几年中葡关系中发生在两国内外的重大事件?

1999年12月澳门主权回归中国, 这也打开了中国外交史的新篇章, 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巩固和提升, 如今的中国已经是世界强国之一。尽管从国家规模、影响力以及地缘分量上来说, 葡萄牙显然不会是中国活跃外交战略的重心, 但中国对葡关系的发展将会给世界展现出优异的洲际外交能力。鉴于葡萄牙身处欧洲以及在葡语世界的重要历史地位, 两国外交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将为中国打开欧洲国家和葡语世界国

家外交的大门。^① 2005年, 中葡两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葡萄牙也因此成为首批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结盟的主要目的是: 促进两国经贸持续增长、加强双边外交关系、深化多领域合作以及建立政治磋商。^②

高层互访无疑是加强双边政治关系最重要的手段之一。2014年5月, 葡萄牙史上最庞大的代表团访问中国, 这是葡萄牙总统近十年来首次访中。其行程包括北京 (政治中心)、澳门 (历史渊源) 及上海 (经济中心)。尤其是从2006年起, 葡萄牙对外投资贸易局 (AICEP) 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值得一提的是, 葡萄牙对外投资贸易局驻上海办事处是葡萄牙对中经济外交的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的机构, 它为中国与葡萄牙、非洲、拉美企业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很大便利。阿尼巴·卡瓦科·席尔瓦总统将中国作为其外交战略的重心, 他到访中国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外交部长、教育文化部长、经济部长等, 这体现出他对双边关系的重视。此次访问, 除了国家要员外, 还有100多位葡萄牙各界人士 (金融业、法律界、房地产业、旅游业以及青年企业家代表), 双边企业界合作硕果累累, 共签署了29项双边合作协议及合作备忘录; 此外, 葡萄牙政府还加强了与澳门特区政府的联系, 并进一步提升了葡萄牙对外投资贸易局北京和上海办事处的职能。^③

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发展对葡关系: 席尔瓦总统的访问受到中国政府最有分量的三位领导人的接见, 他们是: 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和张德江委员长。纵观中国人的政治文化, 非常讲究细节, 有一个细节也体现出中国政府重视对葡关系: 习近平主席结束拉

^① SOARES, Mário, *Macau: Uma Responsabilidade Histórica-Discursos de Sua Excelência o Presidente da República Dr. Mário Soares, Missão de Macau em Lisboa*, Lisboa, 22 de maio de 1990, pp. 3—8, 17.

^② Discurso do Presidente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Jiang Zemin, na Cerimónia de Transferência de Poderes de Macau, 20 de dezembro de 1999.

^① PEREIRA, Bernardo Futscher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n.º 10, junho de 2006, pp. 65—66.

^② *Diário de Notícias*, “Sócrates e Wen Jiabao querem duplicar comércio em três anos”, 15 de dezembro de 2005.

^③ *Revista Macau*, “Visita de Aníbal Cavaco Silva: China tem portas abertas para Portugal”, 5 de junho de 2014.

美访问返程特意经停特塞拉岛 (la isla de Terceira, Azores), 与葡萄牙总统代表、副总理保罗·波斯塔 (Paulo Portas) 进行了会谈。2012 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结束拉美之行返回北京时, 也在该岛经停。^①

此外, 从 2014 年席尔瓦总统的代表团成员组成上, 可看出葡萄牙政府优先与中国发展商贸和投资领域关系。一些重要领域的部长没有出现在团员名单中, 例如海洋农业部部长、环保部部长、国土战略部部长以及能源部部长等。

纵观当今中葡关系, 可以将其总结为“多元”的。两国在商贸、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开展合作。多年前, 一部分葡萄牙国内的大型企业通过合资成功打入中国市场, 例如好利安制药^② (Hovione, 成立于 1959 年, 1979 年起在香港开设办事处, 1986 年在澳门开设办事处, 2008 年与浙江海神公司合资)、费尔斯通公司 (这是一家主营石材的企业, 公司为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业务, 于 2006 年在上海开设了办事处, 专门负责开发和管理中国市场的客户群体)、阿莫林木业 (这家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 它不断与中国公司合资开拓中国市场; 到 2011 年, 它旗下的主营葡萄酒软木塞及其衍生品的合资公司阿莫林软木公司成了世界的领导者)。^③

中国逐步对葡萄牙开放国内市场, 尤其是农产品市场, 其中葡萄牙出口到中国的葡萄酒在近四年中翻了一番, 中国已成为葡萄牙在欧盟以

外的第五大出口市场。^① 2013 年, 德尔塔咖啡 (El Grupo Delta Cafés) 进入中国市场, 并计划在五年内成为中国该产业前五强。此外, 葡萄牙出口到中国的家具总额持续攀升。中国还是葡萄牙汽车第二大出口目的国, 仅次于德国。^② 葡萄牙对中国出口持续增长是不争的事实, 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 中葡双边贸易平衡中葡萄牙和大多数中国贸易伙伴国一样, 仍处于逆差地位且逆差额越来越大。^③

中国对于欧洲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巩固和加强,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值得注意的是, 如今的葡萄牙和整个欧盟正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 而且没有好转的迹象。2011 年 5 月, 葡政府为获得欧盟援款, 与“三驾马车”签署了相关协议, 其中包括葡国企私有化项目。根据协议规定, 至 2013 年年底, 私有化项目须至少为葡政府带来 55 亿欧元收入。在 2011 年的私有化项目中, 中国三峡集团和国家电网参与葡萄牙电力公司 (下称葡电) 和国家电网项目竞标, 并先后于 2011 年年底和 2012 年年初, 分别以 26.9 亿欧元和 3.87 亿欧元成功购买了上述两家公司 21.35% 和 25% 的股份, 从而为中资企业在葡萄牙投资翻开了新的一页。2014 年 10 月, 葡电与三峡集团联合设立的中欧清洁能源技术中心揭牌, 研发中心由三峡集团和葡电联合设立, 将利用双方技术优势, 加大新能源领

^① AICEP, “Assunção Cristas China e Portugal convergem acerca da ‘economia azul’”, Portugal Global, 14 de novembro de 2014. Agência Lusa, “China tornou-se um ‘mercado estratégico’ para vinhos portugueses-ViniPortugal”, 14 de março de 2014, <http://www.peprobe.com/pt-pt/new/china-tornou-se-um-mercado-estrategico-para-vinhos-portugueses-viniportugal>.

^② Agência Lusa, “Delta entra na China e espera que mercado entre no ‘top 5’ dentro de 3 a 5 anos”, 21 de outubro de 2014, <http://www.peprobe.com/pt-pt/new/delta-entra-na-china-e-espera-que-mercado-entre-no-top-5-dentro-de-3-a-5-anos>. Agência Lusa, “China é o segundo maior destino dos automóveis produzidos em Portugal-ACAP”, 12 de agosto de 2014, <http://www.peprobe.com/pt-pt/new/china-e-o-segundo-maior-destino-dos-automoveis-produzidos-em-portugal-acap>.

^③ Agência Lusa, “Balança comercial com Portugal é favorável à China em mais de mil milhões”, 12 de maio de 2014, <http://www.peprobe.com/pt-pt/new/balanca-comercial-com-portugal-e-favoravel-a-china-em-mais-de-mil-milhoes>.

^① *Diário de Notícias*, “Presidente chinês na Terceira para visita de 8 horas”, 24 de julho de 2014.

^② *Hovione*, “Hovione no Mundo-Zhejiang, China”, consultado em 16 de outubro, 2014, http://www.hovione.pt/sobre/hovione_zh.asp. *Hovione*, “50 Anos de Excelência em Química Farmacêutica”, consultado em 7 de dezembro, 2014, http://www.hovione.pt/sobre/hovione_hm.asp.

^③ *Veja Portugal*, “China é porta de entrada da pedra portuguesa em novos mercados”, 23 de Julho de 2013, <http://www.vejaportugal.pt/china-e-porta-de-entrada-da-pedra-portuguesa-em-novos-mercados/>. *Wicanders*, “Amorim Revestimentos reforça a sua presença na China”, consultado em 7 de dezembro, 2014, <http://www.wicanders.com/pt/press/newsletter/Amorim-Revestimentos-reforca-a-sua-presenca-na-China/51/>.

域的技术研发和转化,将葡萄牙及欧洲先进的智能电网、海上风电等技术在中国进行应用推广。在此期间,葡电还和三峡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发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水电项目;^①三峡集团总经理还与葡电股东代表进行会谈,表示了长期开发新能源的信心和决心。三峡集团副总经理林春学(Lin Chunxue)在访问期间接受葡萄牙国家电视台采访时曾表示:“葡萄牙是中国最理想的投资国,因其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②

葡萄牙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外商投资的前提。对于中国投资来说,葡萄牙不仅是欧洲的门户,还是可将业务扩展至其他前葡萄牙殖民地的战略枢纽,最显著的例子是,2012年,中石化收购了葡萄牙高浦能源(Galp Energia)巴西公司30%的股权;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中石化在2010年曾认购雷普索尔巴西公司40%的股份,价值71亿美元,这是当时中国石油行业最大的一笔对外投资。^③葡萄牙是中国通往葡语国家的一扇大门,中国通过葡萄牙可以在诸如巴西和安哥拉这些对中国投资抱有热情的国家身上获取利益;目前,中国已成为上述国家石油业最大的投资国。

可以说,如今葡语国家与中国的合作逻辑是“综合性”的。例如,2014年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CPLP,下称葡语国家共同体)接纳赤道几内亚为正式成员国。^④要知道,赤道几内亚的官方语言并非葡语,它也不是一个传统的葡语文化国家,接纳它仅仅是因为它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以及它是非洲第三大产油国。最早提出建立葡语国家共同体的,

^① *Jornal de Negócios*, “Novo presidente da China Three Gorges recebido por Cavaco Silva”, 29 de outubro, 2014.

^② *Jornal de Negócios*, “Cavaco aponta China como” país estratégico para empresas portuguesas”, 16 de maio de 2014.

^③ *Jornal de Notícias*, “Investimento chinês” abre caminho às pequenas e médias empresas “portuguesas”, 4 de Julho de 2012.

^④ *Expresso*, “Guiné Equatorial já é membro de pleno direito da CPLP”, 23 de julho de 2014.

是巴西驻葡萄牙大使何塞·阿帕雷希多·德·奥利维拉(José Aparecido de Oliveira)。共同体于1996年正式成立,由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葡萄牙、圣多美、普林西比和东帝汶组成,是一个基于共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国家联合组织,其秉承三大宗旨:协调成员国间的政治和外交、整合成员国间的文化以及推动经济发展。^①赤道几内亚的加入引发了共同体内部巨大的争议,葡萄牙代表认为该国的加入不仅会让共同体“贬值”,还因该国的独裁政体和人权问题给其他成员国带来“政治污染”^②。尽管饱受争议,但赤道几内亚还是顺利加入,这恰恰说明了葡语国家共同体目前工作的重心是发展经济,不仅重视中国对能源业的投资,也注重非洲大陆能源业的开发。值得一提的是,赤道几内亚于1970年与中国建交,与安哥拉一道均为中国在非洲大陆最大的石油投资目标国。^③

在银行业领域,欧洲银行业持续萎缩,而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银行业则快速扩张。笔者摘取几条该行业最新的动态:2013年,中国银行(世界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卢森堡分行与葡萄牙电力公司签署了一份总额为8亿欧元的贷款协议,并参与了葡电和国家电网的私有化评估;此外,2014年,中国海通证券(中国第三大投行)斥资3.79亿欧元收购葡萄牙新生银行(Nuevo Banco,葡萄牙第二大银行)旗下圣埃斯皮里图投行业务(Banco Espírito Santo Investment)。^④

^① PINTO, José Filipe, “A adesão da Guiné – Equatorial à CPLP”, *Diário Notícias*, 4 de março de 2014, http://www.dn.pt/inicio/opiniaio/jornalismocidadao.aspx?content_id=3719190&page=-1.

^② *Diário de Notícias*, “Ana Gomes chocada com adesão da Guiné Equatorial à CPLP”, 23 de julho de 2014.

^③ China. Org. Cn., “Equatorial Guinea”, consultado em 15 de outubro, 2014, <http://www.china.org.cn/english/features/focac/183538.htm>. ALESSI, Christopher e HANSON, Stephanie “Expanding China-Africa Oil Tie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8 de fevereiro de 2012, <http://www.cfr.org/china/expanding-china-africa-oil-ties/p9557>.

^④ *Jornal de Notícias*, “BESI vendido aos chineses da Haitong por 379 milhões de euros”, 8 de dezembro de 2014. *Diário Económico*, “Fosun admite comprar Novo Banco”, 15 de outubro de 2014.

除此之外,中国还对葡萄牙的海洋业和港口表现出极大的投资兴趣,尤其是对锡尼什港(Puerto de Sines)。该港是欧洲第三大深水港,是许多货物从亚洲、拉美和澳大利亚到欧洲的进口港,具有非常突出的战略地位,这也引起了中国资本的关注。2013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BD)代表亲赴锡尼什港洽谈投资事宜。至于海洋业,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结束回国途中经停葡萄牙与副总理波斯塔的会谈时就提到了,双方要加强在海洋经济和海洋资源领域的合作。^①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中国对葡保险业投资异常活跃,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复星国际(Fosun Internacional)以10亿欧元收购了葡萄牙最大的保险公司(Caixa Seguros)旗下的忠诚保险(Fidelidade)。复星国际此举不仅成功进入欧盟保险市场,还进一步连通了巴西、安哥拉等葡语国家的市场。2014年,复星国际参与竞标葡萄牙圣埃斯皮里图银行分支机构,同年,该公司还宣布一项斥资1亿欧元收购罗安达(Luanda)一家私立医院的计划。^②

中国对葡萄牙基础设施领域投资迅速扩张,从中得到了高额回报,这让葡萄牙国内的一些人感到不满。对此,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黄松甫(Huang Songfu)表示:“中国投资是受葡萄牙人民邀请来的,时间会验证投资的结果是好还是坏。”^③总的来说,葡萄牙政府对中国投资持欢迎态度。2012年,三峡集团、国家电网与葡电合资,同年中国石化与

高浦能源合资,葡萄牙外交部长对这两项合资表示:中国投资对于葡萄牙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契机,双边企业的合资领域要更进一步扩大,从大型企业延伸到中小型企业。

为了吸引外商投资,葡萄牙政府重启了“黄金签证”(Visado Gold),申请此签证的渠道一共有7个,分别是:(1)向银行转账100万欧元或以上,或购买不少于100万欧元的证券;(2)开办公司及创造10个工作岗位;(3)购置50万欧元或以上的不动产;(4)购置35万欧元或以上的旧房产或者旧区重建房产,其中旧房产指的是30年或以上楼龄;(5)在科研项目投资35万欧元或以上;(6)在文化艺术项目、文物保护或修复项目中投资25万欧元或以上;(7)在面向中小企业的投资或融资基金中投入50万欧元或以上。

据葡萄牙移民局公布的“黄金签证”最新数据,获批的中国申请为1429个,占总数的80.5%,其次分别是俄罗斯(58个)、巴西(55个)、南非(43个)和黎巴嫩(30个)。虽然葡萄牙政府的“黄金签证”营销赚取了大量投资,但是一些管理漏洞,导致众多相关职能部门发生了贪污、洗钱、谋取私利以及挪用公款。^④

中国对外投资活动可以分为两种性质:第一种以地缘经济和政治为目的,中国政府通过大型企业对各大洲逐年渗透,以增强其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第二种则是投资能源和资源,以满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要知道,中国从2013年年底起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石油净进口国。上述两种投资活动尽管性质不尽相同,但是基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内部秩序,两者之间具有统一性和战

^① Cargo News, “Porto de Sines recebeu delegação do China Development Bank”, 30 de maio de 2013, <http://www.cargodicoes.pt/site/Default.aspx?tabid=380&id=9167&area=Cargo.0>
Século Online, “Presidente da China fez escala nos Açores”, 28 de julho de 2014, http://www.oseculonlin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7035.

^② Macau Hub, “Caixa Seguros expande-se em África enquanto se conclui aquisição pela chinesa Fosun Internacional”, 20 de janeiro de 2014, <http://www.macaubus.com.mo/pt/2014/01/20/caixa-seguros-expande-se-em-africa-enquanto-se-conclui-aquisicao-pela-chinesa-fosun-international/>.
Jornal de Negócios, “ES Saúde vai construir hospital privado em Luanda”, 11 de fevereiro de 2009.

^③ Jornal de Negócios, “Huang Songfu: O tempo dirá se investimento chinês é bom para Portugal ou não”, 24 de outubro de 2014.

^④ Jornal de Negócios, “Portugal já atribuiu 1.649 vistos ‘gold’: investimento estrangeiro ultrapassa os mil milhões”, 9 de outubro de 2014. Observador, “Vistos Gold já renderam 1.108 milhões de euros”, 13 de novembro de 2014, <http://observador.pt/2014/11/13/vistos-gold-ja-renderam-1-108-milhoes-de-euros/>.
Observador, “Vistos Gold: 11 detidos por suspeitas de corrupção”, 13 de novembro de 2014, <http://observador.pt/2014/11/13/diretor-nacional-sef-detido-por-suspeitas-de-corrupcao-na-atribuicao-dos-vistos-gold/>.

略协同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其国内秩序稳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国际地位稳步上升有利于实现其政府所倡导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民生目标。

中葡在文化领域也不断加强交流与合作,以推动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认知。两国在2014年签署了一系列关于文化领域合作的协议,旨在加强中葡的文化往来,例如葡萄牙—北京文化中心项目。这是一个传播葡萄牙文化的多功能机构,定期向普通民众开放,举办的活动涵盖展览、电影放映、会议等。此外,葡萄牙广播电视台(RTP)和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开展合作,旨在共享文化和新闻资源。^①

葡萄牙教育领域一直非常重视汉语教育。^②而中国国内学习葡语的人也越来越多,近年来,不仅私人教育机构重视葡语,连许多公立大学也开始重视葡语专业的建设,从长远来看,中国与葡语世界的联系必将越来越紧密。随着巴西的崛起,中国各界已将葡语视为未来对外商务谈判最重要的语言工具之一,中国政府也承诺增加对葡语教育的投入。截至目前,全中国共有26所高校开设了葡语专业。

因曾被殖民的缘故,澳门与众多葡语国家的大学建立了关系,因此澳门是葡语在中国大陆重要的“推广员”。贾梅士学院(El Instituto Camões)和东方葡语中心(Instituto Português de Oriente)是两所殖民时期就开设的葡语教育机构,现在肩负着向全中国推广葡语的使命。^③孔子学院是中国向世界传播汉语和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

其软实力的主要工具之一。在葡萄牙境内共有两所孔子学院,其葡方合作学校分别是葡萄牙的两所高校米尼奥大学(Universidade de Minho)和里斯本大学(Universidade de Lisboa)。^①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孔子学院与地方合作高校的摩擦越来越多,不断有媒体质疑孔子学院在他国境内主导非文化性质的活动。^②

由于所有的孔子学院都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因此中国政府很难摆脱干预他国高等教育的嫌疑。不过由于汉语对于未来世界的重要性,加上葡萄牙政府的大力推广,现在越来越多的高等学府专门开设了汉语专业,汉语在葡萄牙国内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因为澳门的缘故,中葡两国最早的接触可以追溯到16世纪,重要的是两国关系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1999年澳门主权的交接而疏远,澳门的存在让两国关系始终密切。2003年,中国商务部创立了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葡语成员国主要有:葡萄牙、东帝汶、巴西、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由于和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只被列为观察员国。在第一届论坛后,各国提出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办事处(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常设秘书处)及明确论坛的主办地为澳门;2005年,又成立了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常设秘书处辅助办公室,其职责是辅助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

① *Jornal de Negócios*, “Portugal assina três protocolos de cooperação cultural com a China”, consultado em 18 de junho de 2014.

② *Agência Lusa*, “Mandarim atrai cada vez mais portugueses”, 8 de junho de 2013, <http://www.sol.pt/noticia/77621>.

③ *Agência Lusa*, “É a hora do português na China”, 25 de setembro de 2011, <http://noticias.sapo.cv/lusa/artigo/13108110.html>. *Ponto Final*, “Ensino do português na China pode justificar vinda de professores lusos”, 17 de novembro, de 2014. *Plataforma Macau*, “Macau reforça laços com Universidades Lusófonas”, consultado em 10 de novembro, 2014, <http://www.plataformamacau.com/macau/macau-reforca-lacos-com-universidades-lusofonas/>.

① KAPP, Robert et al., “The Debate Over Confucius Institutes”, *China File*, consultado em 23 de junho de 2014, <http://www.chinafile.com/conversation/debate-over-confucius-institutes>. Reuters, “China’s Confucius Institute regrets closure of University Of Chicago center”, 30 de setembro de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9/30/us-china-usa-education-idUSKCN0HP15B20140930>. LEE, Gregory B. et al., “The Debate Over Confucius Institutes PART II”, *China File*, 1 de julho de 2014, <http://www.chinafile.com/conversation/debate-over-confucius-institutes-part-ii>.

② *Inside Higher Ed*, “Censorship at China Studies Meeting”, 6 de agosto de 2014,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4/08/06/accounts-confucius-institute-ordered-censorship-chinese-studies-conference>. *Revista Macau*, “Visita de Aníbal Cavaco Silva: China tem portas abertas para Portugal”, 5 de junho de 2014, <http://www.revistamacau.com/2014/06/05/visita-de-anibal-cavaco-silva-china-tem-portas-abertas-para-portugal/>.

作论坛常设秘书处工作,并提供所需的资源。

中国对澳门的利用体现出实用主义政治的特点,双边论坛不仅增强葡语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同时也会吸引更多富有远见的葡语国家的企业来中国投资,此外,还有助于中国与各葡语成员国之间建立友好互信,尤其是双边高层关系。^①

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每三年召开一次,最近一次召开是在2013年11月。中国副总理汪洋发表了题为“一个平台,三个中心”的讲话,“三个中心”分别是:葡语国家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以及中葡论坛与会国经贸合作会展中心;“一个平台”指的是:中国政府支持葡语国家的经济发展,倡议在澳门设立旨在交换信息、促进商务互动和合作的(中葡)双语信息分享平台。该平台连同三个中心,合称“一个平台、三个中心”。^②2011年,广东省江门市应邀参加由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举办的“澳门国际品牌连锁加盟展”,向世界各地的国际品牌客户推介江门,这不仅推动了澳门与江门市的区域合作,也为在澳的葡语国家的中小企业进入内地市场提供了一个平台。

目前,葡萄牙对外投资贸易局和澳门政府正计划携手,将葡萄牙打造为中国与葡语非洲国家(PALOP)互联互通的契合点。但这样的多边倡议成功的前提条件,是中国与葡萄牙或葡语世界的关系长期健康发展。基于此,葡萄牙总统在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时,反复提及多维“三边合作”战略:葡萄牙是中国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巴西合作的纽带,

^① MENDES, Carmen, “Fórum Macau”, *Nação e Defesa*, março de 2013, pp. 280—285.

^② *Macau Hub*, “IPIM de Macau cria grupo de trabalho para a construção de “Uma Plataforma, Três Centros”, 30 de setembro de 2014, <http://www.macaub.com.mo/pt/2014/09/30/ipim-de-macau-cria-grupo-de-trabalho-para-a-construcao-de-uma-plataforma-tres-centros>.

而澳门是中国与葡萄牙合作的纽带。^①2014年3月,河南首府郑州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葡萄牙之家”(Casa de Portugal),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机构,主要用于宣传葡萄牙产品和吸引对葡投资,同时也将致力于推广葡萄牙文化以及推进两国之家的友好关系。^②

总的来说,中葡关系在经历了长时间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后,当前的发展逐步转向相互倡议、相互投资、共谋发展的阶段。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葡关系正值蜜月期。当然,当前的中葡双边关系中仍然存在不对称,主要因为葡萄牙方面没能有效利用两国自2005年起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巧用澳门身份,通过建立中葡论坛等方式,快速有效地吸收并利用了葡萄牙遗留的政治和经济遗产,不得不说,这样的手段极具“中国特色”。

笔者认为,葡萄牙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联合委员会会议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开发的双边对话机制。该对话机制是双方根据2001年所签署的框架合作协议建立的,会议之前是每两年举办一次,但在2014年葡总统访问澳门时双方将举办时间改为一年一次。截至目前,该会议已举办过两次。

^① *Agência Lusa*, “Primeiro centro de exposição e venda de produtos lusófonos abre ‘boas oportunidades’ às exportações portuguesas”, 23 de setembro de 2011, <http://noticias.sapo.cv/lusa/artigo/13099876.html>. *Plataforma Macau*, “AICEP ajuda Macau a criar centros para a cooperação China - Lusofonia”, consultado a 11 de novembro de 2014, <http://www.plataformamacau.com/macau/aicep-ajuda-macau-a-criar-centros-para-a-cooperacao-china-lusofonia>. *Jornal de Negócios*, “Cavaco Silva diz que visita “elevou parceria estratégica” entre Portugal e China”, 18 de maio de 2014, http://www.jornaldenegocios.pt/economia/detalhe/cavaco_silva_diz_que_visita_elevou_parceria_estrategica_entre_portugal_e_china.html.

^② *Macau Hub*, “Portugal inaugurou Consulado - Geral em Xangai vocacionado para a diplomacia económica”, 7 de setembro de 2006, http://www.macaub.com.mo/pt/2006/09/07/1668/Agencia_Lusa, “China passará a ter ‘Casa de Portugal’”, 10 de março de 2014, <http://www.hardmusica.pt/lazer/turismo/24936-china-passara-a-ter-casa-de-portugal.html>.

结 语

从早期中国封建王朝拒绝和葡萄牙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到后来西方强行打开中国贸易的大门，可以说，中葡之间拥有 500 年的交往史。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两国交往从低层面逐步走向高层面，中间也历经波折，但有一个永远伴随的话题——澳门。早期的澳门受中葡两国影响，成了中西方文化和法律和平共存的一块飞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澳门名义上受葡萄牙管辖，但是其仍遵守中国法律，属于中国领土。两国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始于 18 世纪末，当时的葡萄牙人领土扩张意识不断增强。到 19 世纪，中国封建王朝因鸦片战争迅速走向衰落，葡萄牙趁机占领澳门；但是，葡萄牙人从未否认过澳门是中国的领土这一事实。1911 年清王朝覆灭，从中华民国成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共两党政府从未主动提出从葡萄牙和英国手中收回澳门和香港，因为这两个地方特殊的政治地位能为当时的内地带来诸多好处。直到 1970 末，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后，收回澳门和香港开始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任务。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模式不仅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回归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统一台湾。中葡两国经过多轮谈判达成了友好解决澳门主权交接问题的一致意见。与英国抗拒香港回归不同，葡萄牙对澳门回归持配合态度，这也获得了中国在交接时间和澳门人国籍问题上的让步。

1999 年后，中国对葡萄牙以及葡语世界的兴趣越来越浓。一开始，葡萄牙对中国的主动表现谨慎，但在席尔瓦总统访中后，两国关系有了新的局面。在经历长时间的中国主导后，两国关系开始步入相互共同发

展时期，葡萄牙对中投资也开始不断增加。现如今两国关系仍存在不对称性：葡萄牙未能有效利用 2005 年两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中国则有效利用了葡萄牙遗留在澳门的政治和经济遗产。在 2001 年中葡两国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下，两国建立了葡萄牙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联合委员会会议，该会议两年举办一次。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尚未完全发挥其潜力的对话机制，因为从 2001 年签署协议召开首次会议后，仅在 2013 年召开过一次。不过，在 2013 年席尔瓦总统访问澳门时，双方将会议时间从两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可以说，这是双边关系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步。^①

中国企业在葡萄牙投资活跃，其中的代表有：三峡集团投资能源业、复星国际投资保险业等，这些中资企业将葡萄牙作为跳板进一步打开葡语世界贸易的大门。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中国对葡投资是其全球化步伐的重要一步，而葡萄牙企业对中国采取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策略，2013 年在葡萄牙经济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葡萄牙政府却更加鼓励对中投资，葡企业逆流而上加快了对中投资。对于中葡两国来说，当务之急是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并对两国贸易制定长远的规划，致力于改善双边贸易平衡。当前的中葡关系正处蜜月期，尤其在两国元首互访后更是达到了历史的高点。笔者认为，现在是一个重要契机：构建双边企业互信，构建两国人民相互认知，以及构建两国交互的政治和经济资本。从历史的高度及发展的眼光来看：中葡关系必将引领一个时代。

[卡门·曼德思，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2004 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毕业；1998 年斯特拉斯堡

^① TVI24, “Portugal e China vão realizar reuniões para aprofundar cooperação”, 14 de maio de 2014, <http://www.tvi24.iol.pt/politica/macau/portugal-e-china-va-realizar-reunioes-para-aprofundar-cooperacao>.

伊比利亚美洲研究 (2015—2016)

大学欧洲研究硕士毕业 (专业硕士); 1997 年里斯本理工大学社会政治学院国际关系本科毕业。江苏师范大学伊比利亚美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代表作: 《1986—1999 年间中葡就澳门问题的磋商》, 香港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INDICE

1. Un Análisis de la Creación y el Desarrollo de la Comunidad de las Naciones Latinoamericanas y Caribeñas y de la Convocación de Foro Chino-latinoamericano Xu Shicheng (3)

Breve presentación de autor; miembro de la Comisión Académica de la Academia China de las Ciencias Sociales, ex-vicepresidente del Instituto de Estudios de América Latina, investigador asociado del Centro de Estudios de Iberoamérica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 Jiangsu.

Resumen: December 2011, CELAC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t is a major event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area. The First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China-CELAC Forum held in Beijing in January 2015, it is the integration of Latin America's new platform, a new start and new opportunities.

2. Sobre unos Problemas Concernientes de Estudios de América Latina Jiang Shixue (20)

Breve presentación de autor; investigador de la Academia China de las Ciencias Sociales, ex-vicepresidente del Instituto de Estudios de América Lati-

na, vicepresidente de la Asociación de Estudios de América Latina, investigador asociado del Centro de Estudios de Iberoamérica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 Jiangsu.

Resumen: On the whole, Latin America's economic reforms can be seen as successful; the major devastating social problems is the rising crime rates; there ar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legacies" left over from the Chavez era; and both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must make joint efforts to further upgrade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3. Las Relaciones entre China y América Latina: una Visión Contextualizadora [Arg.] Eduardo Daniel Oviedo (36)

Breve presentación de autor; Profesor Titular Ordinario de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Contemporáneas en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Rosario e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del CONICET. Profesor consulto del Máster Internacional en Economía y Negocios de China e India, IEAU, España. Autor de los libros: *"Argentina y el Este Asiático"*; *"China en Expansión"*; e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ntre Argentina y China 1945—2010"*. Compilador del libro *"Argentina y sus relaciones con los países del Este Asiático"*. Doctor en Ciencia Política por l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órdoba, Argentina. Máster en Derecho, Universidad de Beijing, China. Licenciado en Ciencia Política y Licenciado en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UNR). Traductor público de idioma chino (intérprete de los presidentes argentinos de 1996 a 2010). Investigador asociado del Centro de Estudios de Iberoamérica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 Jiangsu.

Resumen: Este capítulo examina el estado de las relaciones chino-latinoamericanas desde la perspectiva del accionar diplomático chino en la

región. En primer lugar analiza la renovación de su discurso político, a partir de la reconversión de las “asociaciones estratégicas” en “asociaciones estratégicas integrales” y la aceptación de esta categoría por las diplomacias latinoamericanas. Luego evalúa quienes fueron los ganadores y perdedores en la relación comercial, describe la tendencia en materia de inversiones y las caracteriza en tres modalidades. Además, pasa revista a las relaciones político-diplomáticas analizando las visitas de Estado del presidente Xi Jinping a Brasil, Argentina, Venezuela y Cuba en 2014; la relación con los miembros de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y la continuidad de la “tregua diplomática” con Taiwán. En el plano multilateral, se observa que China continúa vinculada con diversas organizaciones regionales, poniendo énfasis en la Comunidad de Estados Latinoamericanos y del Caribe (CELAC). Por último, se presta atención al rol que Estados Unidos ejerce en esta relación y la necesidad de que los países latinoamericanos creen el diálogo diplomático América Latina-Estados Unidos sobre China.

4. Recursos Naturales, Valor Agregado y Complementariedad Económica entre China-América Latina: hacia una Futura Sociedad para el Desarrollo [Arg.] Sergio M. Cesarin (66)

Breve presentación de autor: Coordinador del Centro de Estudios sobre Asia del Pacífico e India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Tres de Febrero (UNTREF), Buenos Aires, Argentina. M. A., Peking University. Investigador del Consej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y Tecnológicas (CONICET). Coordinador Académico y Profesor de la Especialización en Economía y Negocios con Asia del Pacífico e India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Tres de Febrero (UNTREF), Buenos Aires,

Argentina. Coordinador del Centro de Estudios sobre Asia del Pacífico e India (CEAPI),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Tres de Febrero (UNTREF), Buenos Aires, Argentina. Investigador asociado del Centro de Estudios de Iberoamérica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 Jiangsu.

Resumen: A comienzos de la segunda década del siglo XXI, China y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ALC) evidencian la profundización de vínculos sobre la base de la convergencia de intereses político-diplomáticos, similares agendas públicas sobre crecimiento económico y desarrollo, superación de la pobreza y gobernanza global. Para ALC, el “factor China” es-y será-sin dudas clave para entender el despegue económico latinoamericano y su inserción en la economía mundial. Estas tendencias han quedado aún más en evidencia durante el año 2014, cuando sendas visitas de presidentes latinoamericanos a China y la segunda gira regional del Presidente Xi Jinping, abrieron opciones para el rediseño de la futura agenda de vinculación, mediante aumentos en los flujos de comercio, compromiso inversor chino en sectores de mayor agregación de valor y financiamiento de proyectos de infraestructura crítica regional. De esta forma hacia el futuro, el patrón de complementariedad que impone el intercambio de materias primas regionales por bienes de alto valor agregado de origen chino y el predominio de inversiones del gigante asiático en sectores extractivos, puede ser moderado transformando a China en un “socio para el 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5. Los Tratados de Libre Comercio de China en América Latina: Desarrollo y Perspectivas [Chil.] Fernando Reyes Matta (86)

Breve presentación de autor: Director del Centro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sobre China (CELC) de la Universidad Andrés Bello desde

2011. Especialista en periodismo y comunicación internacional. Diplomático, fue embajador de su país en Beijing en 2006—2010. Investigador asociado del Centro de Estudios de Iberoamérica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 Jiangsu desde 2015.

Resumen: El artículo ofrece un análisis sobre el desarrollo y las perspectivas contenidas en los Tratados de Libre Comercio (TLC) suscritos por China con tres países latinoamericanos: Chile (a partir de 2006); Perú (2010) y Costa Rica (2011). En este sentido, es notoria la asimetría desde el punto de vista de la balanza comercial, destacando el predominio de materias primas (recursos naturales y minería) en los casos de Chile y Perú, sin que esto signifique un aumento de las inversiones a consecuencia del incremento en el intercambio comercial. Del mismo modo, la evolución del TLC en el marco de las relaciones entre China y estos tres países latinoamericanos implicará la concreción de una estrategia de mayor dimensión, no estrictamente limitada al acceso preferencial al mercado chino o a la diversificación de los envíos sino a una mayor interacción empresarial y de nuevas formas de producción.

6. China, América Latina y la balanza de poder global

[Venz.] Alfredo Toro Hardy (107)

Breve presentación de autor: Diplomático y académico venezolano. Se ha desempeñado como Embajador en Washington, Londres, Madrid, Brasilia, Santiago de Chile, Dublín y Singapur. Ha ocupado la dirección de varias instituciones académicas en el áre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Ha sido Fulbright Scholar, Rockefeller Foundation Bellagio Center Resident Scholar, Profesor Visitante de las universidades de Princeton y Brasilia, Asesor de la

Academia Diplomática de Londres y Profesor Electo a la Cátedra Simón Bolívar de la Universidad de Cambridge. Es autor o coautor de veintinueve libros sobr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y de numerosos artículos académicos. Investigador asociado del Centro de Estudios de Iberoamérica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 Jiangsu.

Resumen: China ha venido promoviendo activamente un orden económico internacional cónsono con sus intereses. Paso a paso, pero con impresionante consistencia de propósito, dicho país está dando forma a una globalización paralela susceptible de debilitar fuertemente al orden económico dominado por Occidente. De manera simultánea a lo anterior comienza a vislumbrarse el surgimiento de un ordenamiento geopolítico de proyección global, a contracorriente de los Estados Unidos. La confluencia China-Rusia resulta la fuerza motriz de este proceso y, al igual que en el caso anterior, la razón de fondo se vincula a la arrogancia occidental en relación a las sensibilidades y aspiraciones de estos dos países. Esta dualidad político-económica es susceptible de generar una importante fuerza de arrastre en el mundo en desarrollo, dada la gran influencia ejercida por China sobre una parte significativa de éste. En este contexto, la postura que pudiese llegar a asumir los paíse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región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 por Estados Unidos como su “patio trasero”, resultaría particularmente significativa.

7. La Integración Latinoamericana y su Relación con China: Escenarios, Límites, Riesgos, y Oportunidades frente al Orden Mundial

[Ecuad.] Milton Reyes Herrera (135)

Breve presentación de autor: Instituto de Altos Estudios Nacionales del Ecuador (IAEN)/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Ecuador (PUCE) /

Universidade Federal de Rio de Janeiro (UFRJ). Docente Investigador del IAEN, Profesor en la PUCE, cursando programa doctoral de Economía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la UFRJ. Ha sido coordinador del Programa de Estudios del Asia Pacífico y China, y Decano (e.) de la Escuela de Seguridad y Estudios Estratégicos del IAEN. Actualmente es miembro del Consejo Editorial de la Revista Línea Sur de la Cancillería Ecuatoriana y del Consejo Académico del Simposio Internacional de la Red Iberoamericana de Sinología. Investigador asociado del Centro de Estudios de Iberoamérica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 Jiangsu.

Resumen: Este trabajo realizará un acercamiento a los diferentes tipos de integración en debate, e incluso en competencia, dentro de América Latina, desde un método histórico estructural, y desde una perspectiva de Economía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carácter crítico. Así, se analizará de manera general las matrices de integración presentes (o tipos de regionalismo de ser el caso), así como los esfuerzos en marcha; tomando como eje de análisis la relación de intermediación entre los Estados nacionales e instituciones regionales, y las posibles articulaciones y desencuentros que se pudieran generar en su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Finalmente se estudiarán los límites y riesgos dentro de la construcción de la integración, y cuáles podrían ser los escenarios más eficientes para potenciar las relaciones y oportunidades con China, y frente al orden mundial.

8. Las Empresas Chinas en América Latina

[Arg.] Gustavo Alejandro Girado (159)

Breve presentación de autor: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 Matanza (UNLaM). Profesor Titular y Coordinador del Observatorio Asia

Pacífico.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UBA), Facultad de Ciencias Sociales. Profesor. Lic. Gustavo A. Girado, economista y Mg. en RR. II., Coordinador del Observatorio Asia Pacífico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 Matanza, República Argentina. Magister en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FLACSO) y Lic. en Economía (UBA). Profesor-investigador en la UNLaM y en la UBA; Coordinador del Observatorio Asia Pacífico de la UNLaM y director del Proyecto sobre las relaciones sino-argentinas. Fue consultor en los Ministerios de Economía, de RR. EE. y de Agricultura, en el Proyecto Okita II (acuerdo argentino-japonés) y Coordinador del Banco Interamericano de Desarrollo (BID). Con estudios de especialización realizados en Asia, es autor de un libro, de capítulos de libros y de numerosos artículos en medios gráficos. Obtuvo premios nacionales y uno regional (ONU/CEPAL). Investigador asociado del Centro de Estudios de Iberoamérica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 Jiangsu.

Resumen: La Inversión Extrajera Directa (IED) d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se despliega sobre el mundo a partir de la profundización de su estrategia "Go Global", acentuada con la gestión de su creciente reserva de divisas y esquemas de financiamiento, que impulsó el gobierno chino, encabezada por sus empresas estatales, con especial interés para hacerse de recursos materiales e insumos que le garanticen abastecimiento a largo plazo y de calidad. China no es el mayor inversor en Latinoamérica pero sí el que vuelca recursos más aceleradamente, proceso que incluso financia. Las empresas chinas se asientan en Latinoamérica para trabajar en la extracción de recursos naturales, con énfasis en petróleo y minería, aunque es incipiente su presencia en actividades manufactureras y servicios, destacándose los sectores automotriz y bancario, respectivamente. El desembarco en Latinoamérica

no fue ni es sencillo, pues han encontrado dificultades que van de cuestiones culturales y de gestión, hasta de tratamiento e interpretación de las leyes laborales vigentes, el tratamiento político de su relación con los gobiernos locales y nacionales, y conflictos sociales y medioambientales de diversa magnitud.

9. China en América Latina: Perspectivas sobre las Relaciones Culturales **[Mex.] Romer Cornejo (193)**

Breve presentación de autor: Profesor de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de China en el Centro de Estudios de Oriente y África, Colegio de México. Realiza principalmente estudios de historia moderna de China y el sistema político de China. En 2014, autor, en la capacidad de renombrados estudiosos y representantes de la academia nacional mexicana, fue invitado para el primer diálogo entre 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hina y el mundo organizado por el Centro de China Contemporánea. Así, él tuvo la oportunidad de reunirse con muchos jefes de estado, incluyendo Vice Presidente Li Yuanchao, Vicepresidente del Comité Nacional de la CCPPC y el Ministro del Departamento Internacional de la CPC Wang Jiarui. Investigador asociado del Centro de Estudios de Iberoamérica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 Jiangsu.

Resumen: La diplomacia cultural basada en el concepto de ‘poder blando’ tiende a ser la nueva dirección de la diplomacia pública de China hacia América Latina. El gobierno chino se adhiere a los principios de ‘ascenso pacífico’ y trata de forjar una nueva imagen nacional a través de la lengua y la cultura en los Institutos Confucio. Los chinos de ultramar se convierten en una fuerza importante en la promoción del desarrollo de los Institutos Confucio y de la diplomacia cultural china hacia América Latina. En la reciente Conferenci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sobre los derechos humanos, China da

la vuelta a la situación desfavorable por el papel dominante que Europa y Estados Unidos mantenían en el pasado. Esto se debe a la exitosa diplomacia cultural de China. Sin embargo, aún tiene un largo camino que recorrer para establecer y fortalecer su imagen internacional. El gobierno chino implementa políticas tales como invitar a representantes políticos y académicos alrededor del mundo para visitar China, financiar las instituciones académicas extranjeras y a investigadores, publicar libros de expertos y apoyar la investigación entre otros. Estas políticas han sido muy provechosas en situaciones cuando las universidades de los países latinoamericanos han carecido de fondos y el individualismo prevalece en el círculo académico.

10. La Sinología en Iberoamérica: una Revisión hacia la Construcción de una Visión Conjunta

[Mex.] Raquel Isamara León de la Rosa (210)

Breve presentación de autor: Benemérita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Puebla (BUAP, México). Profesor de la Licenciatura en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la BUAP (México). Licenciada en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y Máster en Cultura, Sociedad y Economía China; y estudiante de idioma chino por la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China. Sus líneas de investigación son: Política Interna de la RPCH, Política Exterior de la RPCH, Filosofía Oriental, Empresa Multinacional Asiática y Diáspora China. Investigadora asociada del Centro de Estudios de Iberoamérica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 Jiangsu.

Resumen. El presente artículo retoma la manera en que China ha sido estudiada durante los últimos años, se plantea la hipótesis de que a pesar de los vínculos entre las regiones, es un campo que falta mucho por explorar y,

hasta cierto, punto lejano. Se parte de la idea de vinculación histórica a través de comercio y las olas migratorias, principalmente hacia América Latina. Sin embargo, el análisis se inicia en una revisión de la década de los sesenta, y la empatía del Maoísmo con algunos países de la región. Como un segundo momento, se inicia la nueva fase de la Sinología en Iberoamérica, a partir del fenómeno China a nivel internacional. Para ello, se propone un análisis mediante la teoría de Globalización aplicada a la región. Por último, señalan conclusiones que llevan a la idea de lejanía y de proceso de construcción de un acercamiento académico.

11. La Esencia Tusán: Valores Invencibles en la Tercera Generación de Descendientes Chinos en el Perú

[Perú] Patricia Castro Obando (241)

Breve presentación de autor: Estudiante de Doctorado en l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PUCP)-Universidad de Beijing (PKU). Estudiante peruana de Doctorado que forma parte del Nuevo Programa Confucio de Sinología (2014). Investigadora asociada del Centro de Estudios Perú-China de la Universidad del Pacífico (Lima, Perú). Fue corresponsal en Beijing del diario peruano *El Comercio* del 2006 al 2011. En 2013 publicó su primer libro *Apasionados por el Perú: 18 relatos de personajes chinos con un mismo corazón peruano*. Investigador asociado del Centro de Estudios de Iberoamérica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 Jiangsu.

Resumen: Este trabajo analiza algunos valores y conceptos que llevaron los inmigrantes chinos al Perú y permanecen hasta hoy. Se enfoca principalmente en la tercera generación de descendientes chinos o aquellos que nacieron después de los años 1980 en el Perú y examina las características que

definen a los “*tusanes*” o descendientes de este grupo y sus percepciones sobre China. Para comprender el contexto, también se describe la evolución del concepto “*chino*” en la sociedad peruana, la esencia *tusán* y el factor *chifa*, todos ellos vinculados a la construcción de la identidad peruana. Este trabajo está inspirado en el artículo académico de Isabelle Lausent-Herrera, *Tusan (Tusheng) and the Changing Chinese Community in Peru*, y continúa en esta misma línea de investigación, focalizando en los jóvenes *tusanes* de la tercera generación.

12. Argentina y su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con China en la Era Kirchner [Arg.] Rubén Laufer (264)

Breve presentación de autor: Instituto de Estudios Históricos, Económicos, Sociales e Internacionales (Idehesi) y Programa de Estudios de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América Latina (Pehrial),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U. B. A.). Profesor de grado y de posgrado en la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Autor de numerosos artículos publicados en revistas argentinas y extranjeras, entre ellos: “China y las clases dirigentes de América latina. Consolidación y bases de una ‘relación especial’” (*Revista Mexicana de Política Exterior*, 2008); “China ¿nuestra Gran Bretaña del siglo XXI?” (*Revista La Marea*, 2010); y “China ¿‘país emergente’ o gran potencia del siglo XXI? Dos décadas de expansión económica y de influencia política en el mundo” (*Observatorio de la Política China*, oct. 2014). Investigador asociado del Centro de Estudios de Iberoamérica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 Jiangsu.

Resumen: Durante las presidencias de Néstor Kirchner (2003—2007) y Cristina F. de Kirchner (2007—2011 y 2011 a la actualidad), China se

convirtió en uno de los principales socios comerciales, inversores y financieros de la Argentina, en competencia con intereses norteamericanos y europeos de antiguo arraigo en el país y en la región. L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establecida con China en 2004 fue elevada a la categoría de “integral” en 2014. La acelerada expansión de las relaciones económicas y políticas con China tiene como correlato el desarrollo de importantes grupos terratenientes y empresariales argentinos asociados a intereses estatales o privados de la potencia asiática. Los lazos comerciales y la radicación o asociación de capitales de China en las economías locales a nivel nacional y provincial son descritos como una oportunidad que permitiría a nuestros países desarrollar sus producciones, diversificar su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y disminuir su endeudamiento. En la Argentina, sectores con fuerte influencia en ámbitos empresariales, gubernamentales, académicos e incluso periodísticos promueven la adaptación de áreas estratégicas de la economía local a la complementación con China. Sobre esta base se habla de la posible gestación de una nueva dependencia del país sudamericano a la ascendente gran potencia oriental.

13. Sobre de las Relaciones Integrales de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entre China Y Brasil **Jiang Shixue (289)**

Resume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have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covering almost all areas. However, there are eight myths surrounding the China-Brazil relations: there is a brewing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that people don't fully appreciate; China only wants to import raw materials from Brazil and does not wish to make direct investment there; China's imports of Brazil's raw materials have made it hard for the South American nation to escape the “Dutch Disease” or the so-called trap of “resource cur-

ing”; the value of the Renminbi (RMB), the Chinese currency, is kept too low, thus putting Brazil in an unfavorable position to compete with China; Brazilian manufacturers are getting killed by cheap Chinese imports that make Brazil's industry uncompetitive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and at home; China's market is not widely open to Brazil; China does not support Brazil's effort to become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nd, China and Brazil are scrambling for Africa. Apparently,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hina-Brazil relations, the above-mentioned myths must be defused.

14. Análisis de la Política de Empleo de México ante la Crisis Financiera Mundial y su Éxito **Ding Bowen (305)**

Brevepresentación de autor: profesor de la Carrera Hispánica y portuguesa de la Segunda Universidad de Lenguas Extranjeras de Beijing.

Resume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rupted in 2008 caused varying degrees of impact o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s the most associated Latin American country with the US economy, the impact on Mexican economy was the most obvious. For example, economic growth slowed down, unemployment increased, and the overall economic situation was rather difficult. Faced with this situation, the Mexican government introduced a series of employment policy designed to guarantee and promote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recovery. In recent years, the Mexican government's employment policy has achieved a certain success, curbed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in a certain degree, thus served to strengthen social stability, to consolidate consumption and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s,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disadvantages.

15. La Política Exterior Venezolana de Chávez a Maduro: Entre la continuidad y la realpolitik del Cambio

[Esp.] Roberto Mansilla Blanco (324)

Breve presentación de autor: Investigador del Instituto Galego de Análise e Documentación Internacional, IGADI. Centro de Estudios Iberoamericanos, Universidad Normal de Jiangsú (Xuzhou, China)

Resumen: La transición entre la presidencia de Hugo Chávez, fallecido en marzo de 2013, y la actual en manos de su sucesor designado Nicolás Maduro, no define a grandes rasgos la articulación de una nueva estrategia de política exterior para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Caracas sigue apostando por la configuración de un mundo multipolar y multilateral no hegemónico, perspectiva en la cual sigue manteniendo un tenso pulso con respecto a EEUU, a pesar de los tímidos intentos por reacomodar la relación bilateral. No obstante, y mientras se prioriza en los esfuerzos por fortalecer la posición hemisférica venezolana a través de la integración regional, en especial dentro de la CELAC y del MERCOSUR, se observa cierta parálisis de actuación en torno al ALBA, matriz clave de la acción exterior de Chávez. Por el contrario, Maduro comienza a diseñar un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con China que se intuye como prioritaria a corto y mediano plazo, particularmente relevante ante la crisis financiera y económica actualmente existente en Venezuela.

16. Un Estudio de la Lucha entre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de Chile durante el Gobierno de S. I. Allende Gossens He Xi (341)

Breve presentación de autor: Profesor de del Centro de Estudios de América Latina, Universidad de Estudio de Lenguas Extranjeras de Tianjin.

Resumen: Partisan struggle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l cause why the Allende government's "Chilean Road to socialism" reform faile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roots, contents and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Allende government's internal partisan faction. Before Allende came into power, the Chile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lean Socialist Party had four debates on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the nature of bourgeois democracy, the pattern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path to socialism. After Allende took office, the "The Unidad Popular" government was soon split into the "the moderates" and "the radicals". Both have drastic arguments over major poli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path to the "the Chilean Road to Socialism", the political role of the army, the political position of the Chilean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 and economic reform. Their quarrel continued to be escalated into a political fighting between two factions, making the Allende government unable to perform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resulting in the decline of "The Unidad Popular" government cohesion. As internal political was in turmoil and cabinet ministers changed frequently, U. S. took advantage of this to interfere in Chilean domestic affairs. The partisan struggle accelerated the failure of Allende government's "the Chilean Road to socialism".

17. Cuauhtémoc: desde el Emperador Último del Imperio Azteca hasta el Símbolo de la Nación Mexicana Xiao Junyi (361)

Breve presentación de autor: Teacher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umen: The image of Cuauhtémoc, "the greatest hero in Mexican history", can be confusing. The last Aztec emperor and Indian hero evi-

dently epitomises the Mexican national culture and history. However, the symbolic meanings and their specific interpretations of his image vary considerably amongst Mexicans, due to the perspectives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and political parties of different eras: from a patriot to a traitor, from the symbol of a nation to the obstructor of modernisation. By analysing the changing symbolic meaning of Cuauhtémoc, this study aims to interpret the Mexican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ology of post-Hispanic era, as well as the demands, interests and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social classes. This study also tries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is issue.

18. Sobre la Idea de Gran Colombia y la Integración latinoamericana
Lan Bo (377)

Breve presentación de autor: profesor of School of Foreign Study,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Resumen: The foundation of Grand Colombia is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vent in the integration of Latin America. However, such progress is interfered due to political conflicts, economical depression after World War II,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military leaderships' political ambitions. After 1830, early separatists including Páez, Monagas, Guzmán, out of respect to Bolivarianism and personal agenda, raised the idea of re-build the Grand Colombia. Among them, including the current of thought of rebuilding the Grand Colombia directly raised by Bolivarianist Mosquera in New Granada and Venezuela. In this article, by analyzing the up and downs of Grand Colombia, issues will be int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of Latin America, and advice will be given to solve such issues.

19. A evolução d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

[Port.] Carmen Amado Mendes (396)

Breve presentación de autor: Professora Auxiliar da Licenciatura e do Mestrado em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da Faculdade de Economia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FEUC). Doutora (Ph. D.) pela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Universidade de Londres (2004). Mestre (*Diplôme d'Études Approfondies*) pelo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Européennes*, Universidade Robert Schuman, Estrasburgo (1998). Licenciada em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pelo Instituto de Ciências Sociais e Políticas (ISCSP), Universidade Técnica de Lisboa (1997). Autora de *Portugal, China and the Macau Negotiations, 1986 - 1999*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e de várias publicações na área das políticas interna e externa chinesas disponíveis para consulta em: <http://www.uc.pt/feuc/carmen>. Investigadora associada del Centro de Estudios de Iberoamérica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 Jiangsu.

Resumen: Portugal foi a primeira potência europeia a chegar à China e a última a partir. Desde o assentamento português, em 1557, Macau desenvolveu ao longo dos séculos uma autonomia e identidade distintas às dos restantes territórios do Império Português, resultantes de um status quo que permitiu, durante séculos, a coexistência pacífica entre duas matrizes culturais: ocidental e oriental. Os padres Jesuítas foram os embaixadores de facto de Portugal na corte de Pequim, decisivos também na propagação do cristianismo e da ciência ocidental no país. Na segunda metade do séc. XX, 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 conheceram duas fases completamente distintas, marcadas inicialmente pelo não-reconheciment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pelo regime ditatorial português, com a Revolução Democrática de 1974 a constituir um ponto de inflexão que resultaria no reatamento de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em